

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

# 教制教典与教学

# 目 录

	.....	1
	.....	7
	.....	14
一	僧装改革运动之回顾 .....	14
二	先要认清立场 .....	15
三	僧装的特点与问题 .....	16
四	中国僧装改革的争论重心 .....	18
五	向反对改革者进一言 .....	18
六	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吧 .....	19
七	新乎僧乎 .....	22
八	我的建议 .....	29
	.....	34
一	袈裟是什么 .....	34
二	二类僧衣 .....	35
三	坏色是点净 .....	36
四	坏色是染净 .....	37
五	应用何种染色 .....	37

六	点净与染净 .....	38
七	金黄色衣 .....	40
八	印度僧侣服色不同 .....	42
九	中国僧众服色沿革 .....	43
	.....	47
	.....	56
	.....	65
一	前言 .....	65
二	求精要——选藏·续藏 .....	66
三	求完备——新编整体大藏经 .....	68
四	求通顺易晓——语体文本 .....	69
五	求传布世界——译藏 .....	72
六	两项先决问题 .....	73
	.....	76
	.....	88
一	弘法人才的重要 .....	88
二	律学中心 .....	89
三	禅学中心 .....	91
四	教学中心 .....	93
五	现代的弘法人才 .....	95
	.....	99
	.....	105
	论闻法 .....	105

二	学法之目标与程序·····	107
三	初学者从三门入·····	115
	·····	118
一	总说·····	118
二	用在修行·····	121
三	用在学问·····	124
四	用在事业·····	132
五	劝除三病·····	135
	·····	137

## 一 泛论中国佛教制度

佛教，当然是“正法”中心的。然佛法弘传于人间而成为佛教时，正法就流布为“法”（经）与毗尼（律）两大类。这二者，有它相对的特殊性能。大概地说，这是智的与业的；义理的与制度的；个人的与团体的；契真的与通俗的；实质的与仪式的；行善的与息恶的。这些相对的差别，不是可以机械地孤立，而有相应的、相依相成的关系。佛教是这二者的总和，因此必须是二者的均衡发展，适当配合。也就是说，必须尊重二者的独特性能，从综贯的协调中，给予充分的发展，这才能成为完整与健全的佛教。不然，偏颇的畸形发展，势必成为病态的、偏枯的。不幸得很！佛教早就偏于法的发扬了！起初，保守的上座们，固执毗尼——戒条与规制而成为教条，繁琐的仪制。于是乎激起反抗，甚至极端地轻视毗尼。毗尼的固定化与普遍忽略，引起佛教僧众的无法健全，“龙蛇混杂”。偏于法的发扬，与毗尼脱节，不但失去了集体的律治精神，法也就堕入了个人的唯心的窠臼！

弘扬佛法，整兴佛教，决不能偏于法——义理的研究、心性的契证，而必须重视制度。佛教的法制，是毗尼所宣说的。这里面，有道德准绳，有团体法规，有集体生活，有经济制度，有处事

办法。论僧制或佛教制度而不究毗尼，或从来不知毗尼是什么，这实是无法谈起的。所以热心中国佛教行政、制度的大德们，实在有论究教制的必要！

释尊的时代，毗尼主要是为出家众而建立的。“六和”僧制，并不通于在家众（所以毗尼不许白衣阅读），这是时代使然。古代的佛教，出家众有团体组织，而在在家众是没有的。现在，在家众应有团体组织，与僧众混合为一吗？别立在家众的集团吗？无论如何，对于如来所制的团体原则，也还有遵循的必要。

律制或者说僧制，到底是什么？关于这，首先应确切地认定：僧制与政治的本质同一性。从僧制的来源去看，就会明白。“僧伽”译为众，就是群众。但不单是多数人，散漫的乌合一群，而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集团，所以或意译为和合众，大体同于神教者的教会。僧伽与另一种名为“伽那”的，都是印度固有的团体名称。这或者是政治组织——某一区域（律中称为“界”）内的宗族会议或人民集会；或是商工业的组合制度。古代的印度社会（实是古代社会共通的），进入父家长的宗法社会时，人口繁衍而渐次形成家族、部族、种族的集团。部族以及种族内的事件，由各部族的首长，或全族成员的会议来决定。国王，或是推选的，或是世袭的，但权力大都有限。这种古代的共和民主制，自来就与狭隘的种族偏见相结合，所以贵族的民主脚下，踏着无自由无产业的奴隶层。在印度，这就是首陀罗族。等到时代演进，奴隶层开始反抗时，这种政治便走向没落，代以王权的专制政治。王权的扩充，是在推翻贵族，宽待奴隶阶层而逐渐完成的。释尊时代的东方印度，恒河东北的后进民族，如跋耆、摩罗，还过着古代

的民主生活；恒河南岸的摩竭陀，已倾向于王权的集中。当时东方新宗教的勃兴，都是适应这一政治倾向，反抗婆罗门教而鼓吹种族平等。这些新宗教，都有教团的组织。其中，如耆那教称为伽那，佛教称为僧伽。这种宗教集团——僧伽或伽那，都是参照于政制，而使合于宗教目的。政治制度与僧伽制度，可说是同源异流。佛教对于僧伽的一切，称为“僧事”，就是众人的事；政治不也就是众人之事的治理吗？所以僧制与政制，本质上同是人类共处之道，不过对象不同而已。多数人的集合共处，不能无事，有事就不能不设法去解决。如何消除内在的矛盾，如何促进和乐的合作，如何能健全自己而适合生存，如何能走向更合理的境地，如何能实现理想的目标：政治制度与僧伽制度，由此产生，也由此而有演变。不过佛教僧制，虽取法当时的政治与其他宗教的组织制度，然在佛的正觉中，体悟到事事物物的依存关系——缘起性；体悟到缘起诸法的“无常性”、“无我性”、“寂灭性”，从这正觉的大悲中，建设僧伽制度，自有他卓越的特色。肯定人类平等，否认贵族与贱族、主人与奴隶的阶级；男女平等，而并不模仿帝国形态，保持民主自由的制度。唯有从佛的根本教义与僧制的原则中，才能理解佛教的处群治事之道。

有佛教，有僧伽，就有制度。教制是必须顾全到古代的佛制，演变中的祖制，适合现实情况的修正或建立。佛教传来中国的时候，印度的佛教，早已在不大重视毗尼的情况中。部分的重律学派，也只是繁琐仪制的保守；拘守小节，忽略时空的适应，不能发扬毗尼的真精神。所以中国的佛教僧制，起初虽仿效印度，“依律而住”，而实不曾有过像样的僧制。在佛教继长增高的阶

段(会昌以前),僧伽的混滥秽杂,每与佛教的扩展成正比例。南朝的佛教,北魏文帝复法以后的佛教(特别是元代的喇嘛),莫不如此。所以佛教在中国,可说教义(法)有着可赞美的一页,而教制——律制是失败的。然佛教不能不有足以维持佛教的僧制,不能不有适应环境的僧制;等到发觉形式剿袭的印度僧制不能完成任务时,中国的佛教僧制,就向两方面演化。

一、国家的管辖制:这因为佛教发达,僧众跟着杂滥起来,影响社会,影响国家,国家不能不出来干涉。我们应该记着!这是佛教的耻辱,古代有多少正信的缁素,明里暗里在痛心。然而僧众不能健全,不能自治,也就不能怪政治的干涉。古代的政治干涉,大体是善意的,如淘汰僧众,禁止私立寺院,试经得度等等(如恶意即灭法)。如姚兴是佛教的大护法,他却立僧 为僧正。梁武帝更是有名的护法,但他不忍见僧众的秽滥,甚至想自己出来作大僧正。国家的管辖,对于不健全的佛教,实际是有益的。这种管辖制,是国家通过佛教来管理,可说是以僧治僧。姚兴立僧 为僧正,是这一制度的开始;后代的僧统、僧录司等都是。

二、禅僧的丛林制:形式剿袭的律制,自有碍难通行的地方。全盘印度化,或者中国本位化,在东晋末年已引起争论了。谈玄说妙的南朝,当然不能有什么革新。强毅实行的北方,却有新的制度出现。如禅僧的“别立禅院”;三阶教的自成家风,舍戒入俗的三阶信徒,也是“别立科纲”。别立禅院的禅僧,在唐代,适应山林农村环境,参照佛陀的僧制,创设丛林制度。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;他们“辟土开荒”讲求经济自足。这个制度,配合着真参实悟的信心与精进(法的),确乎相当成功。佛教的思想界,虽

已因固定、保守而走向衰落；亏了这丛林制度，总算维持佛教一直到最近。

这两种中国化的教制，一是每一寺院的组织，一是全国佛教的组织，并行而不相悖，一直维持到清末。但中国是家庭本位的宗法社会，而政治又缺少民主代议制，所以寺院逐渐子孙化，丛林也产生传法制，倾向于各自为政，不能从僧官制的统一中，造成民主代议制的严密组合。一盘散沙，佛教与国家民族，患着同样的毛病。

自从西洋的势力侵入，中国的一切都起着剧变。国家多事，简直顾不到佛教，或者不重视佛教，所以让它自生自灭地没落。佛教内部的丛林古制，老态龙钟，不能适应新的剧变。僧众的品质低落，受到古制的束缚、社会的摧残，迅速地衰落下来。禅宗的大德们，除了造庙、修塔而外，还能做些什么？中国佛教进入了从来未有的险恶阶段。太虚大师看透了这点，所以大声疾呼，提倡教制革新。民国四年，写成了《整理僧伽制度论》。以后时势演变，又写《僧制今论》、《建僧大纲》等。以虚大师的僧制思想来说，虽有时迁就事实，而根本主张，还是想合于佛制，僧事僧治，可说是综合过去的二元的僧制——僧官制与丛林制，统一在新的僧制中。对于在家众，有佛教正信会的建议（国内也有了居士林等组织）；希望僧众与信众，都有健全组织，共同来复兴中国的佛教。这虽然与现今南方的佛教国相合，但在中国，不但是墨守老祖规矩（不是佛的律制）的僧众要反对，而时势也有些难以办到！

早在民国元年，中国佛教开始了一种新制度——中国佛教

会,这是一种僧俗混合组织的制度。现在已被看作一向如此,其实是从来未有的划时代的剧变。依律制,出家众的僧事,白衣就是国王,也不容直接过问。现在的混合组织,论法理颇有问题。同时,任何团体,参加者有义务,有权利;而过去大陆的佛教会,不一定如此。这个出家在家的混合组织,所问的是僧尼寺庙事件,经费的来源,也主要是从寺庙中来。而在处理事务,甚至创立法制,由于僧众无人,大都要烦劳在家众。有的出家众不赞成如此,而事实却不能不如此。问题在佛教的外来压力太重,而僧众缺乏组织能力,缺乏向社会向政府的活动能力。佛教——寺院僧众为了维持佛教,自然而然地恳求护法们出而护持。这里面,有久已信佛的,有临时信佛的,甚至有根本没有信心的;有军政名流,豪商巨绅,有时还要拉拢帮会、外道。而正信居士,眼见佛教的多难,也热心护法而不能不问。老实说,离开了在家众,佛教会也许就成立不起来。所以我觉得,护法居士的参预教会,并不合(佛)法;或者不免人事庞杂,邪正混滥,而事实却不能不如此!

我们应认清现阶段的中国佛教制度的特殊意义!希望在这现存的组织中,力求进步,求僧众与信众的品质提高(品质主要是正信、正见、正行),完成护法责任;进一步地促进而使发展到更合于佛法的教制僧制!

## 二 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

教难、国难，现阶段的中国佛教徒，正受着这双重的磨难。东南亚地区——香港、澳门、菲律宾、越、缅、泰、马来亚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锡兰、印度，以及日本、南韩，到处有中国佛教徒的踪迹，虽呼吸自由空气，而由于时局不安定，困难也增多。比较地说，住在台湾的，是安定幸运得多了！然台湾籍的信徒，由于长期与祖国脱节，有点神佛不分。而新近自大陆来的，为数不多，在教化与种种工作上，也不免有才难之叹。中国佛教的厄运，虽由于时局好转而跟着好转，然我们切勿自我陶醉，存有幻想！我们必须认清，近代的中国佛教，本来不够健全，不够理想。经此一番大破坏，留下一笔糊涂账，已不再是改良或整理，而需要从废墟上来重新建立了。这是怎样的艰巨！这岂能从幸运中得来！这一切，必须中国佛教同人，从速改进组织，奠定新生的基础。否则，我们——中国佛教的境遇，也许比现在还要苦痛得多！

中国佛教，因内伤外感而来的情势恶化，确乎相当严重！然从世局转移与社会变动去观察，中国佛教的前途，是用不着悲观的，反而充满了新生的希望。这可从两方面说：

中国佛教的内伤，是多年积弱。首先是，撑持了千年的禅

宗,虽曾经隆盛到极点,然禅者专重向上,专重直观,轻视严密的义学,事相的修习,佛教这才从平淡而贫乏,贫乏而衰落起来。陈陈相因,禅宗也就失去开建时代的活力与创新精神,变成丛林祖制的保守者。无上妙方便,失去了时代意义,适应活力;本身不能适应时代,反而或多或少的障碍着进步。四十年来以坐香维持门庭的禅宗,日渐没落,到现在可说形骸都没有存在了。禅宗已失去中国佛教主导者的能力,将退居佛教一宗的地位。佛教的思想与制度,不再是旧制所能束缚,而有依承佛制,参酌古今,本古代禅家的长处而重新建设的必要。

中国佛教不容易前进的大障碍,是寺院家庭化。中国为宗法社会的国家,家庭意识,使佛教变质。一方面,佛寺不传贤而传(法)子,结果如通货一样,劣质的通货打倒了优良通货;住持的资格,也不再是德学而是应酬与攀缘了!一方面,丰富的寺院经济,成为内部的侵轧因素。既不用于文化事业、福利事业,自不免成为社会觊觎的目标。太虚大师常说:中国佛教的教产,活像一块臭肉,徒引来蝇蚁恶狗,大抵在愚僧与土豪、劣绅、地痞、流氓的勾结中消耗净尽。现在经过一番大变动,家庭的宗法制,无疑地要随时代而过去;寺院土地,也不免成为问题。中国将来的政治非趋向修明不可;土劣流痞也决不会过去那样的,寺院无脂可吸。我们尽管困难,却有摆脱恶势力,而进行佛教合理建设的可能。

中国佛教过去,病在脂肪过剩,不肯运动,臃肿不灵。等到体力衰退,又积食不消,这才从外强中干,演变到奄奄一息。时代的苦难,等于节食或绝食一番(留心虚脱!)。经过一番净化作

用，大可以去腐生新，恢复活力！我们不要为寺庙、产业，似僧非僧的丧失破坏而悲哀。经过一番苦难，如我们还不觉悟，还在旧梦重温，这才是真正的悲哀！中国佛教展开了重新建设的可能与自由的机运，问题在我们自己。

从另一方面说，中国佛教的衰落，并非单纯的佛教问题，而是与我国族的衰落同一情况。近百余年，由于西方来的外力侵袭，国家与佛教才急剧地困难起来。连西方的神教，也以拯救者的身份而来。经过几次战争，国人的自信心消失。于是乎打倒迷信，打倒孔家店，扔掉线装书，改造方块字，从根否定了自己，而主张全盘西化，拜倒于唯物的功利文明。这一盲目的西化论，增加了国家的困难，促进了佛教的衰落，障碍了进步的革新。热心于全盘西化的先生们，应该是反省的时候！假使不以现况为满足了愿望的话。现阶段的国难教难，从远大处看，这并非来自亚洲，来自中国与佛教；这一时代苦难，实是西方唯物的功利文明的泛滥与横决。马克思生于德国；《资本论》作于英吉利；共产政权的初步成功，是东正教的化区——俄罗斯。这些，不是别的，是西方的传统文明——政治与宗教，在高度的发展中，暴露出根本破绽，而演进到自我的否定。西方的传统政治，本身存有困难，也还没有想纠正过来。到现在，西方还只有金钞、武器，加上上帝，不能提供崇高的理念，来鼓舞全世界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们。经过重重苦难，人类是会新生的。新的时代，决不是暴发的共产主义，也不是传统的帝国主义，也不会是“基督文明的世界统治”。世界的真正得救，重建和平，是充满理智的、和平与宽容的东方精神的复活。综合了西方的积极成分，而创开的世界

新时代。在这时代大转变中，中国与世界的佛教，无疑为东方文化的重心，而要重新被高扬起来。在这西方文明动荡而待变的过程中，佛教徒应该加倍努力，弘传净化人间的觉音，我们还能懈怠和悲观吗？

从佛教本身说，已大大减少了改进的障碍。从国际情况说，佛教与东方的文明，有了再度高扬的机运（否则世界将黑暗到底）。中国佛教前途是光明的。光明，会鼓舞每一佛弟子，真心、热心、悲心，将身心奉献三宝，为护教、为利生而努力！

佛教的前途是光明的，不过还在未来，非要从艰苦的现在，努力去打开困难，奠定新生的基础不可。这一责任，不能不归重于台湾的佛徒。

当前的佛教要务，据个人的看法，不出三方面——教化，组织，事业。论到教化，一、长期的专修的教学，如佛学院、研究会之类，以养成住持众的弘教、信护众的协助教化为目的。这是复兴佛教的根本大计！二、定期的一般的教化（或是星期日，或沿用旧制的朔望），以摄受信众、灌输佛教的基本信解为目的。这是极重要的，最好要有一定的宣讲师，讲题一贯，不致矛盾重沓；这才能引令深入，导入组织，格化信众的身心。三、巡回布教，也非常重要。但如没有定期的宣讲，这只能引发短暂的感动而已。四、一期讲经，这是旧有的宣教方式，着重仪式。这适于安定的农业社会，在讲究经济时间的工商社会，多少要改善一点。否则，摄受的信众，都是老年的、优闲的，不能普及于青年的、一般的。不过隆重的仪式，偶一为之，倒也有不少妙用！此外，如文字宣传，利用电影、唱片，广播宣传等。

论到组织，近代中国佛教，从来没有健全过。实有加强组织、健全组织的必要。组织，不是万能的。如积聚的材料，是断瓦朽木一堆，那无论如何设计配合，也难以成为坚固的房屋。佛教徒一向量多而质不精，所以加强组织与充实教化，应同时着重，收相互推进，促进新陈代谢的成果。在现阶段，希望台湾省分会，各县市支会，积极地健全发展起来。“中国佛教会”要处于辅导的地位，使佛教工作，在台湾佛教的名义及机构里，发展成长。使台籍佛教同人，有自发的为教热心！大陆移来的与台籍的四众弟子，有增进互信互谅的合作必要！“中国佛教会”所应着重的，应为全国性的。我以为，一、大陆移来的四众弟子，应由中佛会领导，使他都能纳入组织，加强进修。这对于台湾佛教，可起一种示范作用。对于未来的佛教整建工作，应集中意志，有所准备。二、散处国外的中国佛徒，应取得联络。各地的组织与个人，虽不能（也不必）属于中佛会，中佛会应特立一侨教机构，负联络通讯，以及友谊的指导与鼓励的责任。团结散处国外的有力（并不等于有钱）而真诚的佛弟子，这对于将来的复兴工作，必有重要的贡献。三、与世界佛教，取得多方面的联系。

论到事业，我们首先要有一根本认识——佛教要取得社会（中坚分子）信仰、政府尊重，必须兴办利乐社会的事业。因为在社会一般人的心目中，这些有为的事修，比了生死重要得多！大家为什么不策发悲心，量力尽力而为？最好，在各县市或全国的名义下来办理，不以个人及一寺为单位。因为，以一人一寺来办，力量小，成绩不容易表现，而且容易为不良分子所把持（过去大陆每有此种现象）。佛教无我，何必一定要归于自己呢！

现在，住持台湾佛教的，有大陆移来的出家制，及台地（日本式）的在家制；还有闽式的斋姑制（女众不剃发，不受出家戒，自称为出家），彼此每不免误会。其实，纯从出家比丘（及尼）众的僧制而论，僧混俗融的“中国佛教会”——管理僧众的组织，根本就难得合（佛）法。我以为，内地来的出家制，等于天主教；（蒙藏旧教及日本）台湾一分的在家制，等于耶稣教。斋姑，实为“净行优婆夷”，不能说是出家的，但也不妨自成一派。如真能充实自身，提高德学，健全组织，积极于社会的文化事业、福利事业，我相信，都可以延续发扬佛教，一定会比现在要像样得多。否则，量多而质不精，无组织，不作利乐社会事业，大陆式的佛教，即使有少数做到戒德精严，了生脱死，也救不了佛教（四十年来一直在衰落中）。如不能表现于品德（日本式的，从来不曾受出家戒，而我们却要以比丘律仪去衡量他，本来不恰当。然在家众也有在家戒，至少人类须有应有的人格）、学问、事业，单是顺俗的娶妻食肉，于佛教能有何用处？我们要认识当前佛教所急需的工作，协调谅解去为佛教而努力！

散居国外的佛教徒，以福建、广东籍为多。说来希奇，国内的中坚分子，不知为了什么——似乎并不是灵魂得救问题，却乐于接受西方的神教。而侨居海外的，在饱经外国统治的滋味下，激发为强烈的祖国爱，一直在坚强地保持从祖国带来的佛教信仰。侨居国外的佛弟子，比较说，经济力强而文化低，这在佛教中，即信仰真切而理解不足，多修福德而少修智慧。希望能善用经济，不单是布施作福，能引导走上不但有信仰，而且有慧解的佛教。海外佛教的领导者，能着重这点，才能确保国外的中国佛

教，而发展为进一步的隆盛。此外，如彼此间的联系，与祖国佛教界的加强联系，都是最重要的。而对于近从国内流移出来的佛弟子，希望能多多给以协助，使能为佛教安心修习与弘化。

一想到大陆佛教徒的遭遇，真是痛心万分！在苦难中，希望大家能有一确切的认识——佛教的精神，是基于谅解的同情而发为“慈悲为本”。在释尊降魔成道的今日，大家要有佛魔不相并存的决心。大家不用忧虑！佛教的存在，并非敲打唱念，并非供养礼拜，并非形像寺院。真实而更本质的佛法，是由于我们的皈信三宝，于心灵深处，发展智慧与慈悲，而向于真实的自由。真能正信而深刻地解入，什么也不能破坏我们。阴霾黑暗，会因晨风与曦明而消失！经上说：“以般若波罗密多故，心无罣碍，无罣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（真自由与解脱）。……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”让我们在三宝的恩威中，得无恐怖、离苦厄的自由吧！谨以佛陀的慈音，遥远地寄向大陆，为万万千的佛徒祝福！

说来话长，就此作一结束。我的片段的意见，不一定是恰当的，但是真诚的，愿意提供于四众同人之前。一套严密的计划，一个伟大的设想，不一定适合于当前实际。我觉得，在相互谅解的组合团结中，充实教化与多做福利事业，各从自己的岗位做去，是永不能变更的方针；如希望佛教复兴的话。这一切，要把他安放在“真心”、“诚意”的为佛教的磐石上！